

中美關係之回顧與展望

紀念本誌發行人王雲五先生逝世週年學術討論會紀錄

本年八月十四日爲王雲五先生逝世週年忌日，雲老生前爲台灣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兼東方雜誌發行人，商務及本刊於是日下午七時至十時假台北市重慶南路二段十五號中華文化大樓一樓禮堂，舉辦中美關係學術討論會，以爲紀念。討論會邀請六位學者專家，擔任主講人及評論人，分別就中美關係之回顧、中美斷交後關係之檢討、及中美關係之展望，發表意見。主持人爲政大教授、商務總編輯兼本刊發行人朱建民先生。討論會採公開方式，主講人及評論人發言完畢，由聽衆提出問題討論。到會聽衆二百餘人，其中大多爲學術界人士及政府官員，整個禮堂座無虛席，紛紛提出問題，均經主講人及評論人加以解答，足見各方對中美關係之重視。以下爲討論會各主講人及評論人發言紀錄。此項紀錄因亟待付印，不及請發言人校定，如有錯誤或不妥之處，由本誌負責。聽衆所提問題及主講人與評論人之答覆，爲篇幅所限，未能刊載。

本誌識

六十九年八月十八日

主席致詞：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爲紀念商務印書館 王故董事長雲五先生逝世週年忌日，特別舉行中美關係學術討論會。承蒙各位先生、女士光臨，非常感謝。我們舉行中美關係學術討論會，有二個原因：

(一)中美關係的份量與我國和其他國家的關係不同，儘管中美關係發生較中日關係、中俄關係、中英關係、中法關係爲晚，但是中美關係在國人心目中，比我國與任何其他國家關係都要重要，事實上確乎很重要。

(二)王雲老生前對國際外交問題很重視，對中美關係尤爲注意。六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國卡特政府宣布與我國斷交，並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時，雲老爲此曾寫信給卡特，並撰文論述，刊載於東方雜誌，發行號外。

基於以上兩點理由，今晚特別舉辦中美關係學術討論會。本討論會分爲

三個階段，研討題目及主講人、評論人如次：

第一階段：中美關係之回顧，內容包括自政府遷台至中美斷交期間雙方關係的回顧。主講人魏良才先生，評論人關中先生。

第二階段：中美斷交後關係之檢討，包括中美斷交迄雙方建立新關係的檢討。主講人張忠棟先生，評論人程建人先生。

第三階段：中美關係之展望，探討中美未來關係的發展。主講人杜蘅先生，評論人金耀基先生。

時間分配共三小時，主講人及評論人，就各階段中美關係發言完畢後，歡迎在座諸位聽衆，提出問題，參加討論。現在首先請第一階段「中美關係之回顧」主講人魏良才教授講述。

魏教授爲美國奧克拉荷馬州立大學哲學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兼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魏良才先生：

主席、各位老師、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今晚很榮幸，有機會在此地與各位來討論中美關係。本人同時也感到非常惶恐，在座有我的老師、學術界前輩，對中美關係都有很深刻的認識。好在我第一個主講，有拋磚引玉的作用。現在就本人研究中美關係的心得，向各位作一報告，請各位指教。

自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美外交關係，大致可以區分為三個階段：

- (1) 一九四九—一九五八。
- (2) 一九五九—一九六八。
- (3) 一九六九—一九七八。

—第一階段（一九四九—一九五八）

大陸淪陷前夕，中美兩國的關係，因為美國國務院在九四九年八月五日發表白皮書而陷於最低潮。由於國務院在白皮書中，對中華民國政府極盡詆毀之能事，使美國民眾對中華民國產生誤解。一九四九年八月間美國的民意調查顯示，美國民眾多數反對援助中華民國。

大陸淪陷後，杜魯門總統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公開表示美國將不介入中國內戰，也不會對台灣之中華民國政府的軍隊，提供軍事援助或建議。

但是韓戰却為中美關係，帶來了轉機。

一九五〇年六月廿七日（也就是北韓南侵之後兩天），杜魯門下令美國海空軍，協助韓國部隊作戰。他同時下令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以維持台灣海峽之中立化。

但杜魯門同時也表示：台灣未來地位之決定，有待於太平洋安全恢復後與日本問題的和平解決，或聯合國的考慮。此為日後「台灣地位未定」謬論的起源。

一九五〇年七月廿八日，藍欽（Karl L. Rankin）被任命為駐華公使，這是美國政府在韓戰爆發後對華關係上唯一積極的表現。

一九五〇年十月廿五日，中共在蘇俄的指使下，派遣「志願軍」參加韓戰，十天後并發表「抗美援朝」宣言，指責美國侵略韓國。韓戰的爆發

，暴露了國際共黨的擴張及侵略野心，而中共的參戰，則改變了美國人對中華民國及中共的看法。

一九五一年一月廿三日，美國參院通過決議案，要求聯合國立即宣佈中共在韓國為侵略者，并表示反對准許中共進入聯合國。二月九日，美國與中華民國簽訂協防互助協定（Mutual Defense Assistance Agreement），與我們所熟知的協防條約不同。根據這個協定，美國對中華民國提供軍事援助，以供「維護內部安全及合法自衛」之用。

五月一日，美國成立軍事援華顧問團，并恢復對中華民國的軍經援助。

雖然韓戰爆發後中共的介入，改進了中美之間的關係，但在杜魯門任內，由於國務院內決策階層，多為親共份子所把持，美國政府對中華民國的支持并不積極。一直到艾森豪就任總統，中美雙方在反共的立場上，始採取積極合作的態度。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日，艾森豪就職未及兩週，在其國情咨文中，便明白宣告，巡弋台灣之第七艦隊，將不再負有阻止中華民國軍隊反攻大陸的任務。四月二日，美國將駐華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中美關係益趨密切。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中美兩國簽訂協防條約。中美協防條約雖然確認了中華民國政府的國際地位，為台灣的安全提供了保障，但也對中華民國執行其反攻大陸的任務，設下了限制。條約中雖無明文規定美國可以干涉中華民國反攻大陸的行動，但在十二月十日杜勒斯與中華民國外交部長葉公超有關該約的換文中，兩國曾獲得諒解：不得美國同意，中華民國不逕行反攻大陸。由此可見，美國對中華民國之態度，雖因韓戰而有甚大之轉變，但支持之程度仍有所保留。

尤其值得注意者，自一九五〇年代中期，中美兩國之關係雖日趨密切，但美國政府却同時與中共展開會談，在美國國內及國際上，造成「兩個中國」的假象，也替美國的對華政策，徒增困擾。

美國與中共之會談，肇始於一九五三年韓國的「板門店會議」，一九五四年為解決中南半島問題的日內瓦會議，美國與中共又皆應邀參加，但雙方真正面對面的正式會談，直到一九五五年八月才開始。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中共攻佔一江山。一月廿四日（也就是在一

江山失守之後六天)艾森豪總統正式咨請國會，要求授權使用美國武裝部隊協防台灣、澎湖以及與防禦這些主要島嶼有關的其他地點。參眾兩院立即就艾森豪的咨文，分別提出聯合決議草案，主張授權艾森豪所要求的權力。一月廿五日，眾院以四一〇票，通過「台灣決議案」。

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共參加亞非萬隆會議，中共「總理」周恩來四月廿三日在萬隆發表聲明，表示中共願意就「緩和遠東緊張情勢，特別是緩和台海地區緊張情勢的問題，與美國舉行商談。」

針對中共的建議，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堅持任何有關台海地區情勢的會談，必須邀請中華民國參加。但國會內若干有影響力的領袖，都主張立即與中共會談，中共對會談所表露的虛偽誠意，使美國政府在國內外遭受極大的壓力。因此，杜勒斯四月廿六日在記者會中發表聲明，表示美國願與中共會談。此一聲明，改變了美國當初所堅持的任何有關台海情勢的會談，必須有中華民國參加的立場。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美國與中共在日內瓦舉行第一次所謂「大使級」會談，展開雙方此後十五年漫長而沒有結果的談判。

從一九五五年八月初到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中，美國與中共之間，一共舉行了七十三次會談，毫無結果。(會談中止)

一九五八年八月廿三日，中共對金馬外島發動猛烈砲擊，挑起第二次台海危機。九月四日，中共宣佈將領海擴大為十二海里。中共的目的，顯然是為了恐嚇替中華民國外島補給護航的美國船艦。美國政府拒絕接受中共十二海里領海的宣告。杜勒斯在同一天(九月四日)對中共提出嚴厲警告，說如果中共企圖以武力奪取外島或台灣，則美國將引用中美協防條約以及國會對總統的授權，使用美國武裝部隊，保護金馬外島。在美國強硬態度下，中共軟化，并由周恩來發表聲明，表示中共願意恢復與美國的會談。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五日，美國與中共在華沙恢復會談，此亦為雙方之第一次華沙會談。此後十二年，會談地點沒有變更。在第一次華沙會談中，由於中共重申美國退出台灣的要求，而美國則主張先停火後談判，雙方堅持不下，所以沒有達成任何協議。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會談中美國會向中共建議以非軍事化、中立化或聯合國託管方式，來解決金馬外島問題，並認為

必要時，可將外島問題，提交國際法院判決。九月卅日，杜勒斯在記者會中，也明白表示在與中共達成可靠之台海停火協定後，中華民國應該從金馬外島撤退其駐軍。他同時暗示如果中共在外交立場上有所讓步，美國可能改變對中共的政策。所以很明顯的，自第一次華沙會談，美國對外島問題的立場，已開始作對中華民國不利之轉變。

二 第二階段(一九五九—一九六八)

自一九五九年起，中美關係進入第二個階段，美國逐漸開始軟化其對中共之立場。但自一九六〇年起，中共對美國之態度却轉趨強硬。因為北平與莫斯科爭奪共黨陣營之領導權，兩者之分裂已日趨明顯。中共在內部及國際上，標榜「反修、反帝」，以表示其為正統之馬克思主義者，既反「蘇修」，當然就更不能不反「美帝」。

一九六一年年初，艾森豪政府任期屆滿。在艾氏的第一任期內，美國已與中共進行會談，但在中國問題上，尚能採取絕不妥協堅決支持中華民國的立場。

自一九五九年開始，美國政府之態度，已有明顯之轉變。

一九六一年自甘迺迪總統就職後，雖然力圖改善美國與中共之間的關係，但由於中共堅持反美立場而沒有結果。甘迺迪任內，美國與中共在華沙僅會談十六次，未能達成任何具體協議。中共對甘迺迪的敵視，尤甚於對艾森豪。毛澤東曾經說過：「甘迺迪比艾森豪更壞、更危險。」對於這句話，甘迺迪也始終耿耿於懷。

在詹森任內，美國政府亦竭盡所能，試圖與中共接觸。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共舉行第一次核子試爆。詹森在十八日的電視中發表談話，表示中共此項試爆，為一嚴重而令人憂慮之事，美國人不可忽視。至此，美國人對中共畏懼之心，實已無可掩飾。而美國內部要求與中共謀和的呼聲，也愈形高漲。

尼克森在一九六八年當選總統之後，即表示將致力於謀求改善美國與中共之間的關係。但是在他就任後的第一次記者會中，尼克森表示美國反對讓中共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他同時強調，除非中共在重要問題上態度有所改變，美國將不會改變他的政策，但是尼克森政府並沒有放棄與

中共的接觸，而中美之間的關係，也進入第三階段，開始作對中華民國不利之轉變。

第三階段（一九六九—一九七八）

從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舉行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之後，中共也開始改變對美國的態度。因為自從所謂「九大」之後，中共的所謂「文化大革命」，形式上宣告結束。中共在外交上，又開始積極對外活動。雖然在四月十四日通過的中共黨章總綱裡，中共猶公開聲言要「打倒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打倒以蘇修叛徒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但實際上，中共已開始考慮在外交上，採取「聯美制俄」的策略。

迫使中共改變對美國態度的最大因素，是一九六八年八月廿日蘇俄的入侵捷克，以及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在烏蘇里江中蘇邊境爆發的珍寶島事件。中共恐懼蘇俄藉布里茲涅夫的「有限主權」理論，對中共核子基地發動突襲，因而企圖拉攏美國，對抗蘇俄。這正是過去二十年來，美國政府所夢寐以求的，焉能不欣然就之。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美國與中共經過多次接觸後，雙方同意恢復華沙會談，第一三五及一三六次會談分別在一九七〇年一月廿日及二月廿日舉行。第一三七次會談，原定在五月廿日舉行，但由於尼克森在五月初進兵高棉中共藉口取消會談。自此以後，由於尼克森政府尋求與中共接觸的新孔道，所以華沙會談就未再恢復。

自一九七一年，中共展開所謂乒乓外交之後，尼克森政府對中華民國及中共的態度，有了明顯的轉變。尼克森政府一方面敷衍中華民國，一方面却積極而秘密的打通與中共直接溝通的孔道。尼克森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季辛吉，在七月一日接見我駐美大使沈劍虹，商談中華民國在聯大的席位問題，當天晚上即搭機前往巴基斯坦，秘密轉赴北平。季辛吉在北平與周恩來會談達十七小時。七月十五日晚上，尼克森對美國民眾發表電視談話，宣告季辛吉自北平訪問歸來。尼克森并表示他已接受中共邀請，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之前，訪問中國大陸。尼克森政府的這手「兩面外交」，不僅嚴重地傷害了中華民國，也震驚了所有美國的盟邦。當年十月底，中華民國之所以未能保全在聯大的席位，尼克森政府態度之轉變，實為最大的因素。

因此，我們可以說自一九七一年起，尼克森政府謀求與中共所謂「關係正常化」之意向，已十分明顯。

一九七四年八月，尼克森因「水門案件」被迫辭職，副總統福特繼任，季辛吉仍留任國務卿。福特為人平庸，在中國問題上，遵循尼克森的既定路線，積極謀求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福特本人，也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初訪問大陸。

等到卡特出任總統，由於其本人毫無外交事務經驗，所以在對中共政策上，對其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里辛斯基，言聽計從。布里辛斯基雖然是國際事務專家，在外交觀念上有其架構，但他為卡特政府所釐定的對中共政策，仍然脫離不了季辛吉的窠臼，而他玩弄「中共牌」的手法，比季辛吉更為輕率拙劣。布里辛斯基祖籍波蘭，俄國在歷史上曾四次參與瓜分波蘭，因此布里辛斯基對俄國，懷有民族的仇恨。在他為卡特政府制定「聯匪制俄」政策時，多少是受了這種仇俄心理的影響（布氏曾在一九七八年五月訪問中共）。在布氏的外交策略下，卡特政府終於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片面背盟毀約，宣佈中止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

平心而論，美國與中共的建交，卡特政府并非始作俑者。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中美關係上一直存在的一個陰影。這個陰影，有時雖因美國國內輿情或國際局勢之變化而或隱或現，但却始終存在。

四、中美之間的經貿關係

中華民國自一九五一年開始接受美援。美援在一九六五年正式停止。但部份援助計劃（例如根據四八〇公法之剩餘農產品援助）則仍然繼續，一直到一九六八年。

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五年，中華民國接受美援金額為十四億四千四百萬美元，十五年間平均每年為九六〇〇萬美元，若按人口計算，平均每人每年接受六元美金。

一般而言，在美援期間，我國的資本形成有賴美援，國際收支的平衡有賴美元，甚至原料和一般日用必需品的進口都依靠美援。自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三年間，美援佔我國國內投資淨額卅一%，其中基本建設部份，美援比例高達七四%，農業部門投資，美援也佔五八·七%。在國際收支方

面，一九五二—一九六二年，我國的逆差總計十三億美金，其中八八%，約十一億美金是由美援來彌補。所以我們可以說當時若無美援，則必造成通貨膨脹，民生艱困，經濟發展停頓，甚至可能影響政治穩定及國家的安全。因此，平心而論，在一九五〇年代及六〇年代初期，美援對我國可說是功不可沒。

在一九六五年美援停止以前，美國是我國最重要的進口市場：

- 一九五三—一九五五年：美國貨品佔我國進口總額，平均高達四四%。
- 一九六一—一九六五年：比例略有下降，但平均仍然高達三六%。
- 一九六五年之後，日本取代美國成爲我國進口最主要市場，美國產品比例逐漸下降，一九七六—一九七九年平均只有二二%。

從我國出口來看，美國市場在一九六〇年之前，對我國并不重要：

- 一九五三—一九五五年：美國市場佔我國總出口的比例，平均只有四%。
- 一九五六—一九六〇年略有增加，但平均也只佔七%。
- 一九六一—一九六五增加爲平均二〇%。
- 一九六六—一九七〇增加爲平均三四%。
- 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平均爲三七%（以一九七二年爲最高，爲四一·九%，以後開始緩慢下降）。
- 一九七六—一九七九年平均降至二四%（一九七九年我輸美商品總值五十六億四七〇萬美元，佔我國當年出口總值三五·一%）。

雖然比例逐漸下降，但美國仍是我國最重要的出口市場。對美國來說，中華民國市場，在其進出口總值中所佔的比例很小（就以一九七七年來說，美國從中華民國進口的產品，佔其進口總值二·五%，美國向中華民國出口的產品，佔其出口總值一·六%。）

從貿易總額來說，自一九六五年起，中美貿易總額即開始成長，一九七一年起增加更爲快速。一九六五年中美貿易總額爲二億七千萬美元，至一九七一年增至十二億六千萬美元，一九七二年爲十七億美元，一九七四年爲三十六億美元，一九七八年增至七十三億美元，去年（一九七九）高達九十一億美元。

從貿易差額來說，在一九六七年之前，我國對美國貿易都是入超，但

逆差額逐漸減少，自一九六八年起從入超變爲出超，而順差額亦逐漸增大：

- 一九五三—一九五五（—U. S. \$ 84 million）
- 一九五六—一九六〇（—79 m.）
- 一九六一—一九六五（—77 m.）
- 一九六六—一九七〇（+43 m.）
- 一九六八年（+38 m.）
- 一九七一—一九七五（+482 m.）
- 一九七二年七億多美元
- 一九七六—一九七九（+353 m.）

至目前爲止，對美貿易仍是我國外貿中最重要的一環，因爲我們對日貿易逆差，主要是依賴對美貿易的順差來彌補，我們對美貿易的巨額順差，會引起美國工商界的不滿，所以政府這兩年會連續派出幾個採購團，向美國大量購買，以求縮短彼此之間的差額。

中美之間的貿易發展，在未來應該會更爲密切。一九七七年，在美國的外貿伙伴中，我國居第十二位，到了一九七八年上升爲第八位，根據美國在華商會主席派克的分析，我國可能升至第五位。

從我國外貿的形成來看，從一九五〇年代初期開始，美國在我國的經濟成長過程中，就擔當了一個極爲重要的角色。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的統計，從一九五二—一九七九年，在我國的外人投資（包括華僑）共有廿二億五二〇萬美元，其中美商投資六億六六〇萬美元，佔外資的三〇%，僅次於華僑投資（七億四二〇〇萬美元，佔三三%）。如果分階段來看，則美商投資在我國外資中所佔的比例，很明顯的在逐漸下降：

- 一九五二—一九六〇年，美商投資佔我國外資總額的六五·八六%。
- 一九六一—一九六五年的比例是五五·五八%。
- 一九六六—一九七〇年的比例是三八·五五%。
- 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的比例是二六·九三%。
- 一九七六—一九七九年的比例是二三·一五%。

雖然美商投資的比例在逐漸減少，但在同一時期內，外資總額却在不斷的增加。這表示我國的投資環境吸引了更多的外商。我們在外資的形成上，

已逐漸不再依賴美國商人，這是一個好的現象。

根據從一九四九—一九七八年三十年間中美關係的發展來看，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的結論：

(一)美國在韓戰爆發後之所以援助中華民國，主要是爲了要鞏固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連鎖防線，而中華民國是這道防線中的樞紐。美國之着眼點在於本身的利益。

(二)從一九四九年開始，美國始終沒有放棄與中共所謂「關係正常化」的企圖。目杜魯門開始的歷屆美國政府，皆是以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作爲它中國政策的遠期目標。

(三)在斷交前的三十年間，美國對中華民國的幫助，使中華民國能在艱困中屹立不動，美國可說是功不可沒。但是同樣的，如果沒有中華民國這個忠實的盟友，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連鎖防線便不完整，便無法在東亞圍堵共產主義，則美國又如何能高枕無憂的獨霸太平洋達三十年之久？因此，作爲一個盟邦，無論從任何角度看，中華民國皆無負於美國，未來的歷史會爲我們作見證。

主席：謝謝魏教授對中美關係三十年之回顧。接着請第一階段的評論人關中先生評論。

關先生是美國塔夫茨大學佛勒契學院哲學博士，國立政治大學教授，執政黨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經常在報章雜誌發表文章，爲大家所熟知。

關中先生：

主席、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剛才魏教授從政府遷台後至美非建交這二十九年間的中美關係作了非常詳盡的分析，現在讓我作一補充，很感困難。不過，我對這個問題也非常有興趣，願意提出我的看法。

魏教授將中美三十年關係分爲三個階段，我願意將第一階段再細分爲兩階段，即：

(一)一九四九—一九五二。

(二)一九五三—一九五九。

A. 在中國大陸淪陷後，美國對中國局勢探觀望態度，事實上是對我國採取放棄政策，即通常所稱的「放手政策」。後來韓戰爆發，美國本質上對華政策還是觀望態度，其間魏教授也提到許多美國重大的聲明。在此我要特別強調的是，當大陸局勢逆轉，政府未完全撤出大陸之際，美國於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發表白皮書，此舉對中華民國打擊甚大。不僅是落井下石，也可以說是當朋友在受傷時還站上來踩一脚。關於白皮書的發表，歷史會對它作一定論。在一九六九年美國把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對華政策文件陸續發表，三年前又發表馬歇爾使華秘辛。在美國發表的這些官方文件中，可以看出，有些地方是曲解事實，有些地方把重要文件抽掉，重要字句改變，企圖解釋戰後中國局勢的演變與美國毫無關係。我們身爲中國人，並不是要把這種責任推給美國；但是美國對華政策的錯誤，在當時非但不承認其錯誤，且一味狡辯，說是對中國局勢的演變，美國該做的都做了，沒有任何事情是應做而未做的，局勢的發展是美國所無法控制及掌握的。在我認爲，一個政治家在犯錯之後，改變一個國家的命運，歷史應該對它有公平的評論。但是一直到現在，美國許多中國問題專家一談到整個大陸局勢的轉變及美國對華政策，都把責任推給中華民國。我國歷史學家應負起糾正美國對華政策錯誤的責任，這是我們應當正視的問題。

美國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發表白皮書的同時，就研究如何承認共匪，國務院特別成立小組，像費正清就是參與其事者之一。中華民國政府從南京撤退到台灣，當時美國大使館未與我政府一同到台灣，美國務卿艾其遜於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二日對全美記者聯誼會發表的演說中，把中華民國排除在美國的西太平洋防線之外。艾氏的演說三天後，美國撤回在中國大陸的外交人員，這是美國主動撤出的嗎？不是的，而是被中共趕出來的。美國留在大陸的外交人員，不但未受到共匪的尊敬，且受到共匪違反常規的欺侮，如美國駐上海總領事被毆，駐瀋陽總領事被軟禁，最後被中共趕出去。當時共匪如此做，也有他的理由，他必須向蘇俄一面倒，以獲得蘇俄對他的支持，來鞏固其政權。對這段歷史，我們必須了解。

韓戰爆發後，美國對我們採取的措施，完全基於軍事上的考慮，避免

但是從實質上看，新的運輸協定也有若干益處。它使我國空航權延伸，我國飛機可以到美國南方達拉斯、西岸的西雅圖、太平洋上關島、及東岸的紐約。此外，雙方在簽訂新協定時有一項換文，雙方絕不要求改變航空公司之名稱、標幟，及飛機着陸之地點。比較起來，實質上的利益是不小的。在目前中美關係艱困之際，只要我們肯努力，仍然有機會爭取若干的利益。這是要說明的第一點。

第二點，在斷交開始之際，美國官方儘量避免與我國駐美辦事處的官員接觸。但是，最近已有改變。美國同意我台省主席、台北等市市長等訪問美國，并參加市長會議。此外，在今年六月間，參議員史東逼迫國務院賣新式飛機給我國時，邀請我國駐美辦事處代表夏功權去參加他們的早餐會，并見諸於報章。這表示雙方官員已有所接觸，這也許是未來的一個機會。我簡單的報告到此為止，謝謝各位。

主席：謝謝張教授對「中美斷交後之檢討」的講述。下面担任評論的是程建人先生。程先生留學美國劍橋大學研讀法學。曾担任國立政治大學教職。在中美關係演變期間，程先生担任我駐美大使館秘書，負責政治事務，所以對中美交涉的許多事情，程先生都親身經歷。現在程先生是外交部北美司司長，主管美國事務，可說是對中美關係實際情形最瞭解的人。

程建人先生：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剛才聽了三位的話，若干地方於我心有感戚焉。但做爲一個公務員，講話有其尺度，尤其我現在這個工作，可以 Think about the unthinkable，卻不能 Speak about the unspeakable。所以，有時候講話有幾分保留，請大家原諒。

我的評語分爲兩部份。第一部份是就剛才張教授的講述略加補充。第二部份乃就我個人對中美關係的看法作個簡單的敘述，供各位參考。

首先，張教授提到中美關係基礎的依據問題。我想大家知道，中美雙方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並非完全一致。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卡特總統宣佈決定與我國斷交的當天，美國政府就曾對中美未來關係形式與實質的

構想，作了四次類似的說明。一次是在卡特的電視演講中，一次是在美匪發表的公報裡，第三次是在卡特電視演講後答覆記者問題時，第四次是當美國政府發表的正式聲明裡。其後美方還曾陸續的有進一步的解說。就我國而言，我們在十二月二十九日，也就是美國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到台灣來談判的次日，提出我方的五個原則。這五個原則也就是我國希望未來處理中美關係的基本原則。中美雙方的立場當然有很大的差別，相信各位都很清楚，我在此不再重述。中美雙方爲了未來關係的基礎，曾進行了兩個月之久的談判。談判並不是非常順利，在台北如此，後來移到華盛頓繼續談判也是一樣。雙方前後談判共約二十次，在台北談了三次，在華盛頓談了約十七次。其中尚不包括非正式的交談。最後一次是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六日，雙方大致達成了若干協議。不過，在同年一月廿六日卡特政府已經向美國國會提出一個法案，大家稱爲有關台灣關係的「綜合法案」。就是說美國政府未待中美雙方談判告一段落，即逕自提出了關繫兩國關係的單方安排，希望藉這個法案來規範一切今後的中美關係。這個法案非常不理想，我們固然不喜歡，美國國會也很不滿意。經過兩個多月的討論，到三月廿九日才獲國會兩院通過。據統計國會議員提出了一百卅五個修正案，經過議員們投票表決的有四十二個修正案，最後通過的修正案則爲廿六個。這裡大家可以看出，卡特政府原來所提的法案與國會後來通過的法案間是有相當的距離。最後通過的「台灣關係法」，比之卡特政府最初提出的法案，無論文字與精神上都要強太多了。就法律上來說，此一法案是屬美國國內法，美國政府應當遵行。對我們中華民國而言，並無任何約束力量。但是在中美斷交以後各種主、客觀環境下，「台灣關係法」實際上可以說是處理中美兩國間各種關係最爲具體，也較爲合理的一項法律依據。雖然它不是中美兩國間的協議，但是我們也希望美國方面起碼能夠誠意履行這項法案中有關中美兩國關係的規定。這是我對中美關係依據的一點補充說明。

此外，張教授還提到幾點中美關係實際的情形，我也想作個簡單的補充。

第一點，張教授提到「台灣關係法」第十條我駐美機構數字及駐美人員

的待遇問題。張教授剛才提到是十三個總領事館，實際上在斷交前，我國除一個大使館外，尚有十四個總領事館和領事館。在斷交後減少了五個，現在我們在華盛頓的大使館改為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美辦事處，另外在紐約、亞特蘭達、芝加哥、休斯頓、西雅圖、舊金山、洛杉磯、火奴魯魯等地還維持了八個地方性的辦事處。減少了五個外館當然給我們增加了許多不便，不過我們一直在盡量設法改進。有一點可以向大家報告的是，在我們未能恢復其他辦事處之前，政府基於為民服務及促進與地方政府人民友誼的考慮，仍然不斷設法繼續對撤銷領館各地的僑胞、留學生、以至旅遊的同胞提供服務，同時也繼續加強與當地美國人士的聯繫。所以在紐約的辦事處兼辦以前波斯頓地區一切有關事務，芝加哥負責兼辦以前駐堪薩斯總領事館的業務，西雅圖負責兼辦以前駐波特蘭領事館的業務，休斯頓及洛杉磯辦事處負責兼辦以前加里西哥的業務，檀香山兼辦以前關島的業務。

關於我駐美機構人員待遇的問題，剛才張教授也提到了。到現在為止，中美雙方機構人員的特權、豁免及免稅協定還未簽字，不過雙方已經談了很久，大部份內容已經達成協議，希望不久可以正式簽署。這裡想向各位說明的，中美斷交後雙方雖未能立刻簽訂特權協定，但是基於互惠原則，雙方機構人員實際上一直享有若干特權豁免及免稅待遇。我國駐美機構與人員所享有的特權待遇，雖然比不上以前，但大致差強人意。

第二點，張教授談到中美間條約協定的問題。他講得非常詳細，不過我願意再補充說明一下。剛才張教授提到美國國務院曾在一九七九年十月底寫了兩封信給國會議員。這兩封信分別寫給參院外交委員會委員賈維茲和眾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柴布洛基。信中，國務院把中美間的條約協定分為五類。一類是立即需要洽談的，有五項協定。一類是仍然繼續存在的，有廿九個條約和協定。一類是與防禦條約有關，因中美防禦條約失效而隨之失效的，包括七項協定。另有兩項協定是與美國領事地位等等有關，也因無外交關係而隨之失效。第五類是十四種條約和協定，國務院認為或已執行完畢、或因失去時效也已無效。在第一類的五項協定中，其中張教授提到的空運協定已經在今年三月五日簽署了。另外關於紡織品貿易的協定以

及有關多邊貿易關稅暨非關稅減免的協定，亦經簽定。剩下的是科技協定和民用原子能合作協定，尚有待商洽。

第三點，關於「台灣關係法」第二條經濟關係。我覺得張教授提出的關於我國商品輸往美國標註出產地國名稱的例子非常好。我想補充一點的，就是美國國會議員的確幫了我們很大的忙。不過我們政府據理的交涉及工商界民衆合理而強烈的反應，也是使美國政府改變初衷的原因。

另外一點是關於張教授所提武器供應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報章雜誌上報導的很多。我們知道在中美斷交後，美國有一年的時間沒有與我國簽署新的武器銷售合約。不過自今年一月三日起，已開始恢復出售武器給我們。在前年十一月時，我國就有一個清單，希望美方提供我們十八項的武器。今年一月三日，美方同意賣給我們六項價值二億八千萬美元的武器。但是這距我們的理想和實際需要相去很遠，我們希望美國政府顧及我們的防衛安全，能夠儘快同意我們要求的防衛武器。這對我國、亞太地區及美國本身都是有利的。

由於時間關係，我對張教授講述的補充到此為止。剩下的時間，我想談談我個人對中美關係的看法。簡單的說共有四點。

第一點，我認為任何兩個國家之間，沒有任何關係可以替代正式的外交關係，中美兩國之間亦復如此。現在很多人談實質關係或實質外交，雖然很為動聽，但這絕不能作為真正外交關係的代替品。假如說可以作為代替品的話，為什麼美國還要和中共建交而與我國斷交。

第二點，雖然說兩國之間任何其他關係不能替代外交關係，但是，其他的關係也有它的重要性。尤其是中美兩國之間有多年深厚的淵源，而更重要的是我們還有共同的利益與相互的需要。再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假如我們因為沒有外交關係而忽視了加強中美間其他關係的話，非但無助於現況，反而中了中共的奸計。中共就是希望我們與美國的關係萎縮，就是希望我們日趨孤立。

第三點，在目前不能立即恢復中美外交關係的情形下，我們必須面對現實。在處理中美關係時仍然要繼續採取一種肯定的態度、積極的態度、建設性的態度。我始終相信，在國際關係上，以誠相待，把握原則，終究還

是可以行得通的。

第四點，我覺得除了官方的努力之外，民間有相當大的力量可以促進及改善中美關係。除了大家熟知的經貿關係外，最近我們非常高興見到林主席、蔡議長、李市長、王市長、蘇市長、陳市長、柯縣長等到美國去訪問。這種交流活動，從長期來看，對中美關係也是非常有助的。此外，姐妹州市的締結、學術文化的交流、以致於旅遊及其他的交流活動，對中美關係的改善，相信都有很大的幫助。我的評論到此為止，謝謝各位。

主席：謝謝程先生的評論。現在進行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為「中美關係之展望」，主講人是杜蘅之教授。杜教授為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曾担任東海大學政治系主任兼文學院院長，現任東吳大學政治系主任兼文學院院長。他關於中美關係時常有文章發表。

杜蘅之先生：

主席、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我不是政府官員，講話就比較自由些，我發現我所要講的精華部份，前面幾位先生都講了。不過，我仍要向各位就「中美關係之展望」作一報告。

我的報告分兩部分說明：

一、今後中美關係之延續。

現行中美關係，完全根據「台灣關係法」而建立起來的。首先，由「台灣關係法」來看，中美新關係能延續多久，我個人可以作一個肯定的結論，就是中美新關係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會改變。理由有三：

(1) 台灣關係法是一個法案、一個法律，在美國，法律不是隨意可以取消的；如果要取消必須經過很複雜的程序，不像過去沒有法律基礎，可以隨行政部門意志而改變。我相信，在最近的未來，這種關係會繼續延續下去。

我們要注意的是，近年來美國的外交政策幫助我們了解兩國的關係。美國近年來外交政策對中國問題大致朝現在的安排進行，即承認中共，與中華民國維持實質關係。此一外交政策是美國兩黨外交政策，無論那一黨

上台，都差不多。承認中共是由共和黨發動，民主黨完成，此為兩黨共同支持的政策。今年十一月美國面臨總統大選，國人咸認為雷根對中華民國友好，若雷根當選，可能會改變現行對我不利的外交政策。在我看來，大的改變不會有，小的改變也許會有，如執行態度、執行方法，會比過去誠懇些，不會像現在這樣對我們作無理要求，冷漠待遇，未能完全依「台灣關係法」執行。但是雷根也不能逾越「台灣關係法」的範疇，不能改變對中共的承認，更不會與我國復交。原因是美國的政策是兩黨政策，採現在所謂美國模式，即一方面承認中共為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另一方面承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實際有效統治台灣領土，為事實上的統治機關。這個政策有「台灣關係法」來保障與支持，在可見的未來是不會有所改變。

(2) 美國外交權力架構的轉變。依照美國傳統，外交權屬於總統的權力之一，國會向來不過問。但是，自從韓戰、越戰相繼發生以後，國會認為外交大權交給總統一人之手，太危險了，國會數度有分享外交權力的建議，如一九七三年的戰爭權力法即是國會與總統共同享有的外交權力。既然兩者共同享有此種權力，若要改變外交政策，一定要先經過國會通過。我們可以說，改變一項外交政策不是那麼簡單，要得到國會合作通過，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是故不會因為某位總統上台或下台而對此政策有所改變。

(3) 今天能夠破壞中美新關係的就是共匪。中共對中美新關係不斷提出抗議，只有在共匪認為從美國可以得到好處時，他才不會破壞「台灣關係法」。依我看來，美國在與中共建交時，一定與共匪有某種程度的諒解，即共匪承認台灣的特殊狀態，美國給予共匪科技援助，幫助其現代化。中共愈是需要現代化，就愈需要美國的幫助，於是不得不聽命美國安排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既然共匪需要美國助其現代化，對於現有的中美關係就不會提出堅決反對。如此，這種狀態會延續若干年月，去年一月一日起以「台灣關係法」為基礎的中美關係不會改變。

二、我們當然不會滿意「台灣關係法」的安排，因為台灣關係法有許多對我們不利之處，有若干地方完全是形式，無法達到實質利益，我們希望中美關係到一定時間能夠改善。這種改善有幾個時期是可能的：

(1) 美國國會對於從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開始生效的「台灣關係法

案」沒有規定施行年限。但是在「台灣關係法」中有幾條有規定期限。例如，

(a) 第五條海外投資保證，對於美國商人在台投資，美國政府給予保證三年。

(b) 第十二條規定美國國務卿每六個月必須向國會參、眾兩院外交委員會就「台灣關係法」執行情形提出報告，期間為二年。

(c) 第十三條規定有關台灣的法令必須送兩院外交委員會，期間為三年。

從以上的二年、三年來看，將來可能會修正台灣關係法，我們應該趁此機會要求美國友人對於我們不利的地方加以修改，國會對此法案可能會作整個檢討。

(2) 中共今後若加速其內亂外患，將提高美國發言權。一般人認為現行的美匪關係是美國玩中共牌，採聯匪制俄的策略。我的看法是，除此之外，中共也有聯美制俄的意思。中共在此情況下進行過於激烈的話，它會對美國讓步，美國在此情形下可以對中共要求進一步改善美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關係。以目前情勢看來，中共內亂外患激烈，我們可以把握機會，向美國交涉修改「台灣關係法」。

(3) 此外，我們有機會改善中美新關係，就是要由內政做起。我們知道，外交是內政的延長，一個國家的地位的提高，是要由自身做起。自中美斷交後，中美新關係，中歐關係都繼續加強，這是由於政府與人民表現良好，使國際上對我們刮目相看。今後我們政府與人民間應當更加團結合作，以提高國家地位、聲譽，使美國國會在檢討「台灣關係法」時，做有利的修正。

大致說來，以「台灣關係法」為基礎的中美新關係是相當鞏固的，不是輕易可以改變的，但是我們也要把握機會，作對我們有利的努力。

以上我簡單的向各位報告我對中美關係的展望，敬請各位指教。

主席：謝謝杜教授關於「中美關係未來的展望」講述。下面是金耀基先生担任評論。金先生是香港來的遠客，也是美國匹茲堡大學哲學博士。現任香港新亞書院院長，他的文章經常見於報章雜誌，為各位所熟知。

金耀基先生：

主席、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今天是我的老師王雲五先生逝世週年。所以我接到通知，要參與今天的座談，我覺得義不容辭。

談中美關係的展望，並不是說我們希望怎麼樣，或者說必然會怎麼樣，只能說可能會怎麼樣。有些我們不高興的事，可能還會存在；高興的事，並不一定會發生。但是人為的努力，多多少少會改變客觀的現象。

中共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從剛才一系列的討論中，可知不是偶發的事。美國這方面的思想病已經很久了，而過去只是中共缺乏興趣。缺乏興趣也不僅是情緒上的問題。可能是一個政體，在特定時間內，一種政策性的利害上的考慮。基本上，美國與中共關係的正常化，我同意杜教授的看。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匪關係不可能有所改變。因為美國在二次大戰後，已經看得很清楚。至少，在過去兩任總統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兩位主要謀士——季辛吉和布里辛斯基——對全球事務的看法，非常接近。最主要的是，二次大戰後，先是美蘇對立，但逐漸地，這種雙元的權力中心已經為多元的權力中心所改變。假如承認了這樣的世界的政治結構的話，如何來走這着棋子呢？所以，季辛吉喜歡下權力平衡的棋子。而布里辛斯基開始時雖不同意，但後來幾乎是走着同樣的棋子。因為，他要考慮到，世界是個多元性的中心，特別是蘇聯對世界的威脅性，更構成對美國權力的一種挑戰。在這種概念的理解下，如何利用中共，在國際舞台上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在亞洲的權力結構中扮演什麼的角色。中共過去是站在共產主義的陣營中，但是共產主義陣營本身却發生了分裂。在共產主義的陣營發生分裂的情況下，中共有很多理由，要與美國接近。我們打開中國地圖來看，北方接連蘇聯，西南方是印度，現在又加上一個軍事有相當力量的越南。所以，從這方面看，美國之要求中共在國際權力平衡方面扮演一個角色，完全是基於美國本身的利益與需要。而中共與美國建交，也完全是根據其本身所理解的權力利益關係。這種關係並不是不會變。但是在短期內，甚至相當長的期間內，都不一定會變。這是我個人的一點看法。

除了國際或區域性的權力結構原因之外，美國還有國內的因素。不能

否認，美國是個資本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國家對市場是非常有興趣的。儘管中共市場究竟有多大，她不一定弄得很清楚。但美國認為中共大陸的市場可以擴大。同時相信，通過四個現代化之後，這個市場將逐漸會成為美國貨品的重要銷售地。這個觀念為任何美國商業團體所感興趣。中共是基於本身的安全或四個現代化的發展，而美國是基於世界權力爭執的需要，及國內經濟的需要。美國與中共關係的正常化，可說是長期以來到最後相當自然的結果。大家可能記得，中共與美國關係正常化後，產生很大的震驚。這種震驚不僅是在中華民國，在世界其他許多地方都如此。這主要是一種技術性的、表現的方式所產生的。因為大家在事前沒有一點風聲。但從長期的結構性的變化中，却可看出它的端倪。

剛才杜教授提到，將來美國總統如果改變之後，中美關係是否會有所改善呢？我想變化是會有的。但是我個人認為，任何在總統競選期間的諾言，千萬不能看成是海誓山盟。因為當選之後，是另外一個世界，所面臨的是不同的問題。每一個政客都認為這是應該的，談不上段約的問題。所以，不能把競選時的言論作過份認真的考慮。假如雷根當選的話，我相信剛才所提到的情形不會改變。但可能在技術、行政層次上的作法有所改變。譬如剛才張先生提到的我國銷售美國的商品產地的標幟等無聊問題，可能少一點。黨的政策對總統的作法多少有些影響，國會方面的壓力也能影響一些作法。但這不是基本的外交政策，更不是國際上權力結構的問題。

最後杜教授提到一切還要靠自己。我想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其實，今天在座的和我自己都可以這麼說，斷交後，台灣會受到很多挫折，在精神上、情緒上受到很大的震驚。但是，在實際上並沒有太大的變化。美國艦隊撤離了，而台灣海峽並沒有發生戰爭。這多少與世界性、區域性的權力結構有關。因美國要與中共正常化熱切的希望，正如希望台灣目前不要受到軍事干擾是同樣的熱切。台灣所受到的考驗不是很愉快的，但是既然來了，就必須接受。在這方面言，充分地使台灣一千八百萬人口面臨了需要自力更生的局面。過去也許有太多的依賴心，我並不是說要與美國完全切斷關係，因為這是非常情緒性的。要知道與美國繼續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美國本身是會變的。國際權力結構雖在短期間不會變，但在相當長期

中將有所改變。所以，我同意剛才程先生所說，我們並不希望以實質關係代替正式外交關係。但是現今國與國間的關係是多元性的。不純粹限於外交而已。而普及於教育的、經濟的、軍事的、知識的、文化的。我個人認為與美國的外交關係，應視為多層面的關係，美國政府與人民就不一樣，美國行政當局與國會也不一樣。目前儘管台灣看起來很小，但經濟力量却相當龐大。我們可以各種方法來增進彼此的關係。譬如組團到美國各州去購買商品，這是他們歡迎的事。能加強與州政府的關係。進而影響聯邦政府。所以，我希望在真正處理外交問題時，全國同胞要與政府同樣的冷靜，要擴大多方面的關係。要認清一個事實，就是繼續與美國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依賴美國的關係是非常危險的。天下沒有一樣事情是不變的。但是如何求變，如何在求變中保持清醒，去利用環境，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任何機會都是一去不再來。

「展望」，我講得抽象一點比較好，因為「展望」講得太具體，會「展望」錯誤。我講得抽象一點，就不致於犯太大的錯誤。謝謝各位。

主席：由於時間的關係，現在已超過預定的時間，今天的演講會到此結束。謝謝杜衛之先生、魏良才先生、關中先生、張忠棟先生、程建人先生、金耀基先生的演講和評論，也謝謝各位聽眾熱烈參加討論。

實踐 三民主義
光復 大陸國土
復興 民族文化
堅守 民主陣容